

臺灣社會學刊，2004年12月
第33期，頁239-247

評 論

高格孚，〈風和日暖：
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2004年，台北：允晨文化

蕭阿勤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ahsiau@gate.sinica.edu.tw)。

A-Chin Hsiau,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法國 Université de la Rochelle 的高格孚 (Stéphane Corcuff) 教授的這本書，是根據其八百多頁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精華摘要。筆者不懂法文，無緣拜讀其博士論文，因此以下的評論，完全根據其中文專書的內容。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除了一些學位論文之外，台灣還沒有以外省人爲主的學術研究專書。因此這本書的出版，相當值得我們重視。作者指出，外省人經歷了視台灣爲「異鄉」到視之爲「家鄉」的轉變。這種變化，外省人本身既沒有完全承認，其他族群也未曾充分了解。作者研究的主要動機，就在於解釋與分析外省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台灣認同成分。

這本書大致可分爲兩部分。前半部除「前言」之外，第一章討論戰後中國大陸移民入台與「外省人」名稱及族群認同發展的經過、關於外省人國族認同的學術研究與非學術文獻、「族群」與「認同」的理論概念等。第二章則在於回顧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的變遷，以及外省人政治與文化菁英的反應。後半部的第三章，作者分析他在1997年透過個人人際關係、登門拜訪、隨機與半隨機方式針對台北縣市、金門縣、嘉義市、花蓮縣的外省人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綜合這兩部分來看，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指出1988到1997年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或「台灣化」過程中，外省人的國族認同也經歷變化。愈來愈多的外省人認同台灣，他們本身產生明顯的台灣化，亦即「外省人的台灣趨向性」。作者認爲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不是出於政治人物的炒作操弄，而是一個具有「悲情」遭遇的社會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同樣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立基於國家主權：始於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無法分開；晚近全民直選的總統更別無選擇，必須捍衛國家主權而向人民負責。作者強調，本土化的反對者，既昧於台灣歷史發展的本質，也無視於上述民主政治的必然邏輯。

這種經常由外省人政治與文化菁英所展現的抗拒力量，既脫離現實，也徒勞無功。作者指出，外省人的台灣趨向性沒有因為其國家認同危機感而減退，反而繼續增強。因此反對本土化的力量集結與表達，通常不是幫助外省人適應台灣社會，而是強化其心理挫折與社會處境的尷尬，既使他們陷於理想與現實、感性與理性的重大歷史矛盾中，也困擾整個社會，無益於台灣社會與兩岸關係。

作者曾經在台灣生活五年，並與外省人廣泛接觸，細心觀察。做為一位外國人，也許使外省人較容易向他談論國族認同的敏感問題，使他更有面對面探索外省人內心世界的優勢。至少，這樣的「局外人」身分，使作者更能不避諱地表達他對台灣族群與國族認同的看法。作者全書的立論明確，除了上述主要論點之外，更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觀察與洞見。閱讀本書，可以感受到這些觀察與洞見除了來自問卷調查所得之外，更來自作者長期居留台灣而與外省人實際接觸的經驗累積，因而能言人所未能言。譬如作者提到呂秀蓮副總統在1997年競選桃園縣長時的競選文宣以蔣中正為「新住民代表」，企圖爭取外省人支持，事實上卻引起外省人反感，反映了本省籍政治人物對外省人缺乏了解。另外，作者也指出，外省人雖然經常被其他族群當成一個同質的群體，但他們關於國族認同與兩岸關係的看法等，並無共識，其中尤其呈現明顯的世代差異。愈年輕的外省人，顯示更高程度的台灣認同。這種世代的差異，更強化作者關於外省人逐漸台灣化、產生「台灣趨向性」的論點。

本書較大的貢獻，就在於上述對於外省人國族認同變化經驗的分析與發現。在理論的探討上，作者指出既有文獻對族群認同研究的原初論（primordialism）的解釋過當，因為「支持 primordialism 的學派從未做出認同是與生俱來、認同絕不會改變或是認同是單一性的這些定義」（頁61）；而許多研究者經常以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為原初論代表，實

屬厚誣。對於這方面的批評，筆者相當同意。但是作者在第一章雖然區分了原初論、情境論（*situation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ionism*）三種族群認同研究的理論，但是對於三者各自內容與彼此差異，並無清楚的交代與解釋。再者，作者在第63到65頁指出，一些關於台灣族群的研究使用「次族群」概念，實無必要而徒增混淆。這樣的批評雖然不無道理，但是作者的理由恐怕值得商榷。作者認為以漢人為一族群，而同時也以屬於漢人的外省人為另一族群，這樣並無矛盾，「只不過是換了一個角度來分析不同的情況，所以族群的使用是一種狀況性理論的實踐」（頁64）。對作者來說，阿美族等既是族群，各族合為原住民（相對於漢人）也是族群，而所有台灣人民（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算是一族群。我相信很多讀者和我一樣，在這個地方不免要問：如果這些不同的人群都可以稱做族群，那麼族群到底是什麼？如果族群概念可以如此擴充，那麼它與部落、部族、團體、民族等的差別何在？作者認為族群或族群認同概念的使用，「真該視狀況以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它」（頁65）。這種實用的態度，使得族群概念可以變得什麼都是，但是它的確切所指卻更加模糊。這無異瓦解了族群概念在描述與解釋上的有效性。在本書中，作者對族群沒有明白定義。對於本書涉及的經驗研究來說，族群概念在分析上究竟指什麼，並不清楚。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作者對本書另一重要概念「認同」的處理上。作者認為「認同是一直在改變的」，所以無法描述：「如果我今天開始描述我多元、分析不完的認同，明天要繼續時，我自己的認同又已經不完全一樣了」（頁53、54）。人們的認同誠然會變化，就像晚近二十幾年台灣的歷史變遷中，許多人的族群與國族認同有所轉變。但即使如此，認同恐怕不像作者所說的變幻不定。認同深植於個人的與集體的歷史，就像本書所指出的外省人國族認同與政治制度、政治象徵、教

育、語言等的深刻關係一樣（第二章）。在現實世界中的認同議題之所以引人入勝，不僅在於它的可塑性，更在於其頑固深植。後者往往才是使得認同概念有其社會解釋力的地方。事實上，作者不是不了解認同的頑固深植。本書的主旨，不就在向我們展示外省人特殊的國族認同使他們無法完全承認本身的台灣化，而受困於理性與感性的衝突、不滿、與挫折，深陷於歷史的重大矛盾中嗎？雖然不是所有外省人都經歷這種持續而強固的認同所造成的影響，但至少他們大多數人是這樣。作者清楚告訴我們，只有相當少數的外省人願意放棄中華民國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或支持台灣獨立建國。反之，「不能做這樣清楚選擇的人，也就是大多數的外省人，正體驗著讓他們最痛苦的認同危機」（頁122）。如果不是認同的頑固深植，使得人們難以改變自己，那麼如此撕裂人心的認同危機從何而來？如果認同果真如作者所說的變幻不定而難以描述，作者又如何確認有這個認同危機呢？作者如此理解認同的方式，事實上已違背他從認同角度研究外省人精神世界的用意，因而自相矛盾。

如果作者不是真的不了解認同的頑固深植，那麼為什麼在另一方面卻又強調認同變幻不定而難以描述呢？我認為原因有三。第一，這是由於作者為了突顯反本質論的理論立場。在強調認同難以描述時，作者認為，只有「動詞」的認同（to identify with）可以描述，但是「名詞」的認同（identity）不可描述。亦即外省人的identification（認同感，他們認同什麼）是可分析的，而外省人的identity（認同，他們的認同是什麼）是無法描述的，或者說，作者宣稱本書所研究的，並非「what is 外省人」，而是「what makes 外省人」（頁65）。作者以上述這些區分，指出認同不是人們「自己的所有物」，努力表達一種理解認同時類似反本質論的立場。但是關於作者這個反本質論本身的內涵，並沒有明白交代。除了對於族群認同研究的原初論、情境論、與建構論三者內容與差異沒

有明確解釋之外，作者本身的理論立場與這三者的相對關係為何，也不清楚。動詞 / 名詞、identification/identity 之類的區分，事實上相當令人費解，對於澄清其可能的理論立場，沒有太大的幫助。作者一方面了解認同的頑固深植，另一方面又有意避免本質論的傾向。但是由於沒有確切地澄清本身的理論立場，因此就只能強調認同是隨時而變、無法形容的。

第二，上述作者理解認同的方式，同時也由於其主要目的在於呈現外省人在台灣的轉變，亦即其無可避免的台灣化。因此作者對於認同的頑固深植，雖然不是不了解、不注意，但這畢竟不是他研究的重點。舉例而言，在討論馬以工的《老虎吃蝴蝶》一書時，作者指出馬以工已經認同台灣，以台北為故鄉。但作者同時告訴我們，馬以工也自承她「很難脫離自己的省籍與歷史的思考範圍」（頁 53）。對於她無法跳脫「傳統想法」來理解台灣意識發展史，作者則簡單歸諸於「族群本位說」（ethnocentrism）。作者歸結道：「馬女士原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來表達台灣意識，但是過去政治社會化與教育的影響，阻止她接受台灣可以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之理論」（頁 54）。這些討論，很典型地反映了全書的主要關懷是外省人的轉變或其國族認同的「多元化」表現（頁 57），意即作者所謂認同的與時俱變。認同的頑固深植及其緣由，並非其討論重點所在。作者所設定的研究焦點，明顯限制了他對於認同更進一步的討論，阻礙其理論的拓深。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第三，作者期望外省人朝著台灣化的方向繼續改變，認為外省人可以用理性克服焦慮與挫折，他們「只是需要以不同的角度來看未來的一切，然後便可海闊天空了」（頁 52），可以感受台灣的風和日暖。對作者而言，外省人不僅已經台灣化，而且應該繼續台灣化。換句話說，認同是不僅隨時而變，而且應該隨時而變。於是那些「過去政治社會化與教育的影響」只是等待被

超越與遺忘的因素，無須再深究。而那些不願承認本身的轉變、不願接受自己可以台灣化的外省人，在理性上自然站不住腳。筆者無意批評本書作者在應然上的期望，不過這樣的期望，明顯限制了他在實然上對認同的進一步理解。

雖然作者希望本書對「認同」概念有理論性的貢獻（頁20），但本書的主要貢獻仍限於對外省人國族認同變化經驗的釐清。在本書兩大核心概念—族群與認同—的理論思考上，則有待提升。從某個角度來看，作者也許混淆了本體論與認識論。作者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在理論分析上明確告訴讀者，就其研究目的而言，族群與認同指什麼。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兩者「真正的」本質是什麼，但做為知識探索者，作者卻不能不明白地告訴讀者，兩者在他的知識分析上是什麼。目前作者概念化兩者的方式，不管是以族群指涉相當不同的人群，視狀況而用不同角度來解釋，或是以認同隨時變化而無法描述，都相當曖昧飄忽，令人難以掌握，對於族群與認同的理論理解，少有助益。

全書還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作者未附上全部問卷內容，因此讀者難窺全貌。有些題目也許誘導性太強，譬如問受訪者「您認為今日的本省人太重視物質而忽略了文化的重要性嗎？」。這樣的題目如果用來問本省人，也許得到的結果與訪問外省人沒有太大差別，其區辨力有待商榷。有些根據調查結果而做的推論也恐怕過於粗糙，譬如63%的受訪者對上述問題答「是」，作者認為「這其實是族群間的文化偏見，因為這是台灣整體的文化現象」（頁110）。又例如二二八事件是由於台灣人對祖國認同不夠的看法，近半數受訪者表示不贊同，作者隨即認為「1997年時，有50%的外省人，已經理解陳儀政府對二二八事件該負的責任」（頁111）。再者，作者根據少數受訪者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是同一種族，但已變成不同民族，認為「這些人能接受『認同』這個概念的

新看法：一個並非一直都不變的認同」（頁113），這裡的推論也過於簡化。另外，針對受訪者對某個題目選項不同反應的人數百分比，作者的詮釋有時也讓讀者困惑。作者隨著論點發展，刻意低估某些過半數反應的重要性，譬如形容「只有50.3%」、「只有52.4%」（頁117、120）。但在別的脈絡中，對於遠低於半數的反應百分比，卻相當強調其重要性。

本書也有一些地方交代不清或意義模糊。這一部分或許是由於翻譯法文所致，不過筆者無法確定。譬如第三章開始討論問卷發現，其中政治與文化本土化所造成外省人的挫折，以及其反擊與忍受的程度，是本章探討的主題之一。但是「反擊」的意思為何，本章始終沒有說明，讀者只能猜測。反而到了下一章全書接近結論的部分，作者才界定反擊指的是「以暴力的非民主化方式，試圖改變現行的狀態」（頁139）。作者有必要在討論開始時，將概念加以界定。又譬如「前言」談到四大族群的區分出現後，國民黨政府以往使用的名稱如「閩南人」、「山地同胞」等，逐漸被知識份子所更正。但作者所謂「這可能是受到美國『政治正確』的影響」（頁15），所指為何，並不清楚。另外，談到外省人如何在問卷中評價過去自己所受到的社會待遇時，作者強調這個過去，「是真的表示他們『現在』（1997年）所認為在『過去』的差別，而不是以回憶過去所認為的差別」（頁130）。這個區分，有點費解，不知有何不同。另外，全書未附引用書目，譬如第一章註腳5、6所提到作者本人或劉光能的研究、第63頁所涉及「Vermeulen與Govers」兩人的觀點，文獻出處即不清楚（後者應指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1997, "Form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nsciousness." Pp.1-30 i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edited by 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全書的校對編輯，也有不少需改

進之處。封面內頁作者的法文名字拼錯，作者介紹也有錯字。至於內容與附錄圖表部分的錯字，就難以一一列舉。

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戰後外省人流離來台，人不親土親，隨著冷戰與國共對峙格局的確立，他們無意識的台灣化早已開始。至於外省人第二代有意識地批判自己與父祖輩的流亡漂泊心態，企圖更了解台灣的歷史文化並融入社會現實，則遠從七〇年代初就普遍出現。以作者對於世代差異的重視為例，對於這種長遠的變遷過程，本書的討論也僅止於提綱挈領，而還需要依賴歷史文獻、深入訪談等方法來深入探討。當然，對照七〇年代至今三十餘年的歷史發展，更證實了本書的洞見，亦即外省人早已台灣化，只是他們本身無法完全承認，其他族群也未曾充分理解。就這點來說，即使本書在理論等方面有如上述的限制，但其經驗上的發現與討論，不僅相當值得學術界的重視，在台灣的政治公共討論上，也值得大家深思。

雖然指出外省人社會處境的矛盾，也許會使不少人不安，但作者事實上對外省人有相當同情的態度，志在於寫一本幫助外省人了解自己、也促進台灣社會了解外省人的書。歷史正試煉著外省人，也正試煉著台灣其他的族群。落地為兄弟（姊妹），何必骨肉親，寶島自有風和日暖。這正是來自異邦者的逆耳忠言。

作者簡介

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專長為文化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研究興趣為民族主義、集體認同與敘事等。目前研究重點在從世代認同、歷史敘事、與社會行動的關係，探討臺灣一九七〇年代戰後世代與國族政治及文化變遷的關係。